第一章　毛泽东逐鹿五岭的战略

第一节期待“远方”

(1)

北平西山的庆功舞会，历史大潮中小得无法看清的一点微尘。1949年带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除了胜利，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既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摸不着的。

北平，西山，夕阳。

一抹晚霞把漫山枫林镀上一片金黄，较之秋天的红叶更独具韵味。双清别墅大院角上清泉一泓，中间一个古朴的凉亭，毛泽东刚从办公室出来，走进亭中，舒个懒腰，就听到吵吵嚷嚷的童音。

“爸爸”、“爸爸”，两个孩子李敏、李讷姐妹跑了过来，拉着他的手，拖着就往外走。刚从苏联回来，不到九岁的娇娇（李敏）操着还不十分流利的汉语说：“叫你跳舞去，不跳舞就会长大肚子，肚子大了就走不动路。”在孩子后面慢慢走过来的是李

讷的母亲江青。

毛泽东呵呵笑了，抱起年幼的李讷，牵着娇娇去参加舞会，一家四口乐也融融.

这是为庆祝解放军切断浙赣铁路而专门召开的祝捷舞会。渡江战役的顺利进展使会场洋溢着欢乐、胜利的气氛，刘少奇、朱德、罗瑞卿、李先念等在西山的中央首长都来了，主席一来，纷纷上前握手。

音乐一响，首长们领先起舞，一群文工团纯真可爱的女青年把毛泽东围住了，争先恐后地邀请他跳舞，有幸使邀请被接受的女孩便笑靥绽开. 毛泽东搂着舞伴飞快地旋转，朱德总司令慢步欢舞，不管是快三步、慢三步还是探戈都迈着一样步伐，两人相映成趣。刘少奇什么舞都能跳，有时还来两手俄罗斯哥萨克舞，这是在莫斯科留学时学到的，时隔20 年的舞姿，还是那么潇洒。

一个又一个女青年抢着和毛主席跳舞，乐呵呵的主席反倒把夫人冷落了。原来脸带微笑的江青变得烦躁起来了， 欧洲的惯例，必须是国王邀请王后跳第一个舞，作为舞会的开始，现在毛泽东不仅没有请她跳第一个舞，反而像是把她忘记了，她的心一阵阵地往下沉。

江青想得很多，转战陕北两年的战斗岁月给她的健康造成了很大损害，刚进入北平的江青显得特别的瘦弱，体重不到100磅，不要说同文工团活泼的女演员相比，就是同城里丰满的少妇比较，她也自惭形秽，和主席走在一起，一个精神焕发，信心十足，一个脸色苍白，眼神恍惚，陕北山沟里12 个年头的艰苦生活，已经消磨了她的青春，往日以蓝萍著称的俏明星模样，一去不复返了.

女人的最大悲哀就是无法再吸引男人。难道1938 年在延安，她不就是靠着这美妙的身段，出众的容貌，迷人的姿色引起毛席的注意吗？而今天作为一个女人应有的魅力，她几乎都没有了，

谁知道进城之后，会不会变成第二个贺子珍？不邀请她跳舞就是一个征兆，也许她只是个战时夫人，在新的宫廷里找不到自己的位子。

江青痛苦地想着．事出有因，在石家庄她就一度陷于绝望，毛泽东见到了前妻贺子珍的胞妹，也是他的弟媳贺怡，毛泽东对贺怡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中国的老传统”！

什么是中国的老传统？贺子珍并没有离婚，她回来了，江青算什么？毛泽东的小老婆？！江青知道后，几乎无法自制。

贺怡把贺子珍从东北接回来了，在山海关遇到了两个组织上派去的人把她们拦住了，让到天津暂住。中共中央干预了毛泽东的私生活，尽管他是党的主席，也要受党的纪律约束，书记处是集体领导的，共产党是个清教徒式的具有高度道德观念的团体，党的利益迫使毛泽东作出了牺牲。他是个重感情的人，也只能是伤感地嘱咐前妻“要保重身体，顾全大局”，无须多说，“顾全大局”四个字涵括了多少无奈与惆怅。

当贺子珍的事情没有处置好之前，江青只能是天天在恐惧中度过。她的协理员一职实际无事可做，主席忙于工作，整天不回来，睡也是在办公室，江青格外寂寞，只是整天带着两个女孩和小豆子玩．小豆子就是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儿，江青把小豆子当成是自己的儿子了。

对江青的威胁还来自家庭的纠纷。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大儿子毛岸英与江青无法共处，一天晚上争吵后，毛岸英指着江青骂起来：“你一点也不爱我爸，你成天冲着他唠叨。”另一次家庭斗争之后，这个 28岁的儿子对比他大不了多少的继母说：“你不爱我爸,为什么不走？

毛岸英是个情绪化的青年人，他和毛泽东父子间还吵架呢，对这位继母就更无所顾忌了，江青更感到了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孤立。

毛泽东的冷落，贺子珍的阴影，毛岸英的厌恶，甚至舞场上包围毛泽东的倩影花容，都使江青感到一重重无形的压力，难怪后来在苏联诊断出她具有功能性的神经过敏。

在这欢腾的舞会上，感到兴趣索然的人只有江青一个，就在这个时刻，她最后打定了主意——去苏联治病，这是当年贺子珍也选择过的路，毛泽东的两个妻子都选择了去苏联治病的道路，是偶然还是必然？做女人难，做毛泽东的女人更难。不过江青不是贺子珍，她更聪明，意志更坚强，现在的环境也不是战争年代，不会有去了回不来的遭遇。

后来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特里尔认为：“江青的确有病，扁桃体炎，身体也不好，但不是很重。她不在中国治病而要到苏联去治，不是身体原因，而是个人的和政治的原因，反映出在毛泽东的中国作为毛的妻子的为难局面和她复杂的个性。”

到苏联去，可以作全面的身体检查，有好的医疗条件和疗养院，能尽快治好病，养好身体，恢复成熟女性的魅力，再回到毛泽东的身边。以这时的中苏关系，苏联人会盛情接待，说不定能见到斯大林，在国内没能确立的第一夫人的地位，透过外交活动不就成为现实了吗？

这天舞会之后，富有心计的江青百般争取，终于离开了丈夫，到苏联去了。

江青的复杂的心理变化，工作繁忙的毛泽东向来无暇注意，即使在这热闹的舞会上，他也没有体现出丈夫的挚爱，仍然是独自劲头十足地跳他的舞.

一场舞会只不过是历史大潮中小得无法看清的一点微尘，然

而女主角在其中一次又一次地扭曲着自己的灵魂与性格，对于15年后的历史，却绝不是无聊的插曲。

历史莫非就是这样，一切都早就在冥冥中注定？

(2)

斯大林的来信令毛泽东再一次感受到在西柏坡的遗憾，对“远方”来客满怀希望，却只等到一个“只带着两个耳朵来的”特使，他不由得冲口讲了一番关于“真朋友与假朋友”的话。

轻松的音乐，优美的旋律，愉快的心情，使毛泽东根本没有注意江青的离场，舞会很快步入了高潮，毛泽东更有兴致勃勃之感。这时一个参谋走近，对毛泽东耳语了几句，几分钟后毛泽东不被人察觉地悄悄离开了舞会。

回到双清别墅，周恩来副主席已经在等待着他。一见面，打个招呼，毛泽东不待坐下，兴奋地就问：“斯大林的电报？”

周恩来点点头，没说什么，就把译好的电文递过去。电报很长，毛泽东匆匆地浏览一遍，寻找他最希望见到的好消息。

胜利者也有胜利带来的烦恼。随着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结束，一系列新的问题产生了，切断浙赣铁路比预期的时间快了一个月，江南大片地区解放，原来计划的后勤及入城工作跟不上，要不要马上攻打上海，成为急待决策的重要问题。

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攻占上海后，下半年解放军将要进军哪里？原定计划是打到五岭北麓，一切工作安排、人员物资的调拨都以此为准，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有可能趁胜利席卷中南和西南，但其它工作跟不上，一切都需重新部署，这可是千头万绪的啊。

而最大的问题是对苏联的外交。随着进军南方的加速，建国

筹备工作的展开，新中国就要诞生。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陆陆续续来到北平，新政协筹备会议马上就要召开，新的联合政府将成立，争取国际承认，特别是苏联的承认与支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毛泽东一直在等待来自莫斯科的答复。

现在答复终于来了，不过仅是对不久前中共向秘密来访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主要内容是就如何安排新中国的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长篇大论之中却回避了至关重要的问题，苏联是否承认和公开支持新中国政权。

看完电报，毛泽东的第一感觉是失望，他急促地在办公室踱了几步，感到气闷，走出房子，矗立在凉事上，仰望长空。

和苏联“老大哥”的关系是复杂、微妙而又棘手的，必须慎之又慎。毛泽东没有见过斯大林，可打了 20 多年的交道，他能清楚地想象出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尊重斯大林，尊重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指导”地位，可这并不妨碍他一再违背斯大林的意见，独立地指导中国革命……。

周恩来早就跟着到了凉亭上，默默站在背后，他知道、毛泽东不喜欢别人在思考问题时打扰他。

“看来斯大林对我们还是有疑虑的呀。”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在后面，缓慢地作出判断。

“抗战时就说我们不过是些土地革命者，1945 年莫洛托夫居然对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说，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共产党，现在又怀疑我是中国的‘铁托，。”毛泽东说着，摇摇头，苦笑了几声。

周恩来宽慰地解释：“苏联对我们是有怀疑，但态度正在逐渐改变。米高扬临走时一再表示，十分敬佩主席，看来不是虚假的，他回去后确实作了有利于我们的汇报，斯大林虽然一直未表

态，但有迹象表明，他会愿意承认我们的中央政府的。这次回电，还是表明了他们的诚意吧。"

接着周恩来分析了苏共的动向。他对这一评价印象如此之深，以至六年后在和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的谈话中，仍然记忆犹新：

"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呆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了广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做法同他们对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的利益。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总的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时期。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也持保留态度，当然中共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是同苏联有分歧的。"

毛泽东很有同感，连连点头，他恼怒地回想着两个多月前在西柏坡与米高扬的会谈。

早在1948年5月，在晋察冀解放区首府阜平附近的城南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已经考虑了争取苏联承认的问题，甚至决定毛泽东亲自去苏联，向斯大林讲明中国的情况，避免苏联同志发生误会。

那时毛泽东很乐观，甚至在散步时就和警卫员扯了起来："如果在解放区成立政府，苏联会首先承认我们。"警卫排长阎长林反应机敏，马上问："是不是我们要去苏联，商量建立外交关系呢？"毛泽东赞许地告诉他："我是想到苏联去，我们要求苏联政府承认我们的新政府，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苏联能开这个好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

可惜毛泽东估计错了。苏联方面迟迟没有答复，致使毛泽东

在晋西北滞留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终于得到苏方通知，将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

1949年2月米高扬终于来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一起在西柏坡接待了他，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回味着当日会谈的情景：

米高扬资历很深，从1926年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竟连续任政治局委员20多年。这样一个深得斯大林信任，具有卓越政治家素养的老布尔什维克亲自前来，大家都很高兴。

会谈开始，米高扬充满热情地说：“亲爱的中国同志们，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同志到苏联去。斯大林同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将向斯大林汇报，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都是由斯大林同志亲自处理的。”

米高扬很得体地解释了迟迟不答复毛泽东赴苏要求的原因．毛泽东并不计较为此浪费的时间及精力，他记得当时自己很兴奋地回答：“很好，很好，很感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我们也很想听听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意见，你们的宝贵建议一定对我们很有帮助．”

兴奋之余，毛泽东没有注意到米高扬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正式会谈的时候，他才真正领会到里面的含义。

第二天会谈，当毛泽东谈到中国的青年组织形式时，米高扬插话：“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会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成了？”

毛泽东很不高兴地作了解释，“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两亿多，

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

双方都很敏感，表面上谈的是并不显得特别重要的青年组织问题，实质中共与苏共间最大的分歧点之一，就是要不要建立纯粹的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猜疑的核心。究竟是一个或几个青年组织实际是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分歧。

就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一再讲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所以要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这种形式虽然与苏联、东欧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但中国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实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有中国的特定历史，一些具体的政策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会有不同，但不管怎样，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话是这样说，但当时东欧的各个民主国家都正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排除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纯粹的共产党专政，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搞什么联合政府，恰好又出现苏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分歧，斯大林怎么能不怀疑？只是他不想挑起与中共的争议，这就使米高扬之行陷于尴尬的处境。

米高扬听了毛泽东关于青年组织的解释，不想把问题扩大，不愧为专门处理微妙难题的能手，微微一愣后，马上显露出坦白爽朗的笑容，略带歉意地说：“我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意见的，我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也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问题。”

自此以后，在正式会谈中，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置疑的话，也不再提出新的问题，只是静听而已。

一番说话如同一瓢冷水，冲走了毛泽东的满怀希望。不发表意见就意味着有意见，而且更糟，是不愿意坦诚地交换意见，消除分歧。后来在一次闲聊中，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发了一通议论。

“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地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毛泽东注意到，这时米高扬目光游移，似乎忐忑不安，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时隔两三个月，他仍清楚记得当时那冰凉的心情。

米高扬走了，问题并没有解决。当然西柏坡的会议还是很有建设性的，双方谈得很融洽，中共甚至提出了第一任驻苏大使的人选，只是这一切都有待斯大林最后确认。

关键在于斯大林不信任毛泽东，更不相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能完成中国的统一。

1945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霍普金斯和驻苏大使哈里曼与斯大林会谈中国问题，斯大林对美国人说：他觉得蒋介石当中国领导人是最好的，统一中国的将是蒋介石。

1948年斯大林承认自己的估计错了，这是许多文章都提到的“斯大林的自我批评”。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自我批评”呢？那是斯大林和访苏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对南、保两国的党强烈不满，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主席）拼命辩解，斯大林毫不留情地责骂。

双方谈到希腊共产党起义的问题，斯大林直接说：“应该把希腊起义的事收起来！”

有人以中共的成就为希腊共辩解，斯大林勃然大怒说：“诚然我们也可能犯错误！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建议中国同志想办法同蒋介石协商，达成一项临时性的决定。他们口头上同意了但回国后还是自己干起来了——集中力量狠狠打击了蒋介石。结果证明，他们是对，我们错了，但希腊的情况不同，要毫不犹豫

地把起义收起来!”

这段话，与其说斯大林是在作“自我批评”，还不如说，他在发泄对中共的不满，警告保共和南共不要学中国人那样出尔反尔，在莫斯科说一套，回去又另搞一套。

就这样，中苏两党关系好好坏坏拖到了 1945 年的 5月，毛泽东为斯大林的暧昧态度苦恼，斯大林也在为毛泽东头疼. 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人物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复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毛泽东可能是世界上知名的共产党领袖中惟一的一个从未去过苏联的人。

斯大林心目中，莫斯科就是共产主义的圣地. 就像伊斯兰教规说的一样，谁未到圣地朝觐过，谁就不配是真主的虔诚的皈依者。

(3)

缓攻上海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关系？下面所讲的事例与此后半个世纪困扰着中国人的政治命题何其相似。它似乎可以让世人知道，原来“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早就在老祖宗们身上出现了。

正当毛泽东为对苏外交忧心的时候，一个更大的误解却正在形成，也许我们从这个典型的例子中更能了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实质。

就在这一天，从后方赶到第三野战军总部的陈毅老总惊讶地看到，丹阳满街是兵，“这样闲逛，将来十万军队驻在上海，非天下大乱不可。”一个电报打到北平，毛泽东马上喊暂停。1949 年 5月 2 日中共中央指示：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第三野战军暂时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

汤恩伯，使其过早退出上海，迫使我们仓促进入而局势混乱。

这不过是战争中的一次小小过场。过了 25 年，人们从赫鲁晓夫偷运到西方国家出版的回忆录里愕然地获悉，当时的苏共领导人从这件事里得出了意义重大的结论。

“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斯大林这样怀疑的主要根据是毛对攻打上海的做法。当时蒋介石已经守不住那个城市了，可是毛却不让红军前进，拒不拿下上海。

“直到 1949 年底毛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斯大林才听到了毛对攻打上海的做法的解释——而他的解释完全证实了斯大林的怀疑。

“‘你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斯大林问。‘我们为什么要拿下它呢？’毛答，‘拿下上海，我们就得负责养活 600 万居民。’

“很显然，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战争中，毛更多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农民比工人阶级更革命。他不是打进上海去争取那儿工人的支持，而是担心向上海提供粮食的工作会牵制他的反蒋斗争。

“后来斯大林在向我们叙述这次谈话的内容的时候说：‘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斯大林的看法，我认为他对毛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很清楚，对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来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忠实地执行“国际路线”，在苏联的模式中不得越雷池半步，不得在理论与实践上标新立异的，具体的说如像王明这样的人。暂缓进攻上海这样一个简单的战术问题，在这些“老祖宗”

们的眼中，居然放大为“不依靠工人阶级”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难怪苏联人迟迟不肯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表态‘倘若毛泽东当时知道这些非议，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时隔50年，重温这些“老祖宗”们的看法，我们尽可以笑其荒唐，只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曾有过的，也许现在也还未完全摆脱的同样的悲哀。

其实，这件事纯粹是苏联同志的误解，由于渡江战役的军事进展比预期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原来准备的城市接管工作来不及同步完成。4月30日指挥作战的总前委给中央复电称“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好适当准备时，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进）上海、杭州的干部尚在长江北岸，人民币因火车拥挤不能及时运到，煤的问题因缺乏运输工具则更难克服…… 上海还不知有无存粮。而在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进城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 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为好。”

这都是具体的实际困难，解决困难需要的是时间和物资。调运干部、煤、粮食及一切维持城市生存的东西，不是凭精神力量，如斯大林想象的“依靠工人阶级”就能解决的。

对于毛泽东来说，问题还不仅仅是人员、物资那么一些简单的问题，早在渡江战役前，对能否顺利进入上海，他就更有深一层的思考。

第一，是帝国主义会不会武装干涉？中国近代以来有太多的惨痛教训，外国势力往往以维持治安，制止混乱，保护侨民、领事馆为借口出兵中国。太平天国时期英法海陆军直接为清朝守上海城，美国人华尔统率“常胜军”洋枪队出阵作战，李鸿章的淮军全由外国输入洋枪洋炮装备，致使李秀城三次进攻上海均归失

利，功败垂成。

北伐战争里一连串的惨案：1926 年“万县惨案”，英国军舰借口川军扣留英国货轮炮击万县，中国军民死伤五六千人。 1927 年 3 月“南京惨案”，英、美、日、法、意五国使馆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命令各国军舰炮轰南京，中国军民死伤 2000 多人。1928 年“济南惨案”，日本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兵济南。中国军民死伤达万人，北伐部队被迫绕道，日军占领济南一年有余。一桩桩血案，令人触目惊心。上海有英美等国太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驻有外国舰队和军队，假如在进城过程中出现混乱就可能授人以柄，给帝国主义以武装干涉的借口。在进入南京时就曾有士兵闯入美国大使馆，这可是足以被利用作为借口的事情啊！

第二，是能否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管好城市。毛泽东太熟悉历史了，明末李自成进入北京，忙于追脏助饷、拷问官僚富户，搞得人人自危，树敌过多，无法争取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现在同样的苗头也出现了，由赤贫的农民组成的解放军对城里的富人以及城市的文明有一种天然的仇恨，往往表现出强烈的不平衡心理，在总统府里的花园歇马，剪碎红地毯作包脚布，水淹了总统府办公室，这些镜头绝不是电影的臆造。不对部队进行入城教育就极可能出大问题。

毛泽东对即将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有这样的感慨：“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5 月 10 日陈毅在丹阳作报告：“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就进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敢大胆地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这一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是很难领会的，归根结底他们不是中国人，不懂得中国的过去。

(4)

斯大林来信的基调还是劝中共要慎重，不要匆忙进军。毛泽东发出这样的感慨，一个国家要了解别国的情况，深透了解就有一定难度。他深信，只要统一成为定局，斯大林最终会承认新中国。

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北平西山双清别墅。

一番激动之后，毛泽东冷静下来，回到办公室，再次细细地审阅莫斯科来的电报，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第七节，斯大林对中国军事政治形势提出的一些建议：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对蒋介石的战争已经结束，英国、法国、美国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现在中国邻国的边境上，并在邻国以及蒋介石集团所占领的岛屿上造成革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为保住这些岛屿和亚洲地盘，帝国主义可能采取从经济封锁到武装干涉的任何行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南下之后，英美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增加了，因此我们建议：（1）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匆忙进军南方及国境地区，而要认真准备。（2）从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中抽出两个精锐的兵团，把他们部署在港口地区，加以补充，并使之处于战备状态，以预防敌军采取行动。（3）目前不要裁减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放下电报，有所感触：“一个国家要了解别国的情况，在大的方向性问题上是可以的，但对复杂的转折和发展过程，深

透了解就有一定难度。”他感到人家能打电报来提醒，当然是出于好心，但苏联朋友的思路仍然跳不出低估解放军的老套。渡江前斯大林劝告我们不要过江，说是过了江，美国可能出兵干涉。现在过了江，他又以为英美军队在我们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增加了，“不要匆忙进军南方”，斯大林意见的背后，实质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有怀疑。

“前几天，4月24日吧，我对科瓦寥夫（苏联驻中共联络代表）分析了美国对我军进军江南的态度。总的来说，美国近来很谨慎，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美国正在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美国军舰及一营陆战队已经由上海退到吴淞口外，英国军舰伦敦号等亦和美舰一起退往吴淞口外，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恩来同志，你看是否让黄华到南京去，他还算是司徒雷登的学生嘛，接触接触，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不急于争取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可以肃清内部，避免麻烦，与积极争取相比，也各有利弊哟。”

毛泽东所指的是党内对外交工作的一些考虑： 1949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另起炉灶”的方针，不承认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只有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然后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就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是一个在伟大革命中产生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外交方针，它满足了中国人民100年来收回主权的强烈愿望，达到了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目的。然而一刀切，追求完美效果的做法却增加了日后外交的困难。毛泽东并非完全没有想到，所以若有可能，也不妨接过美英伸出的手。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硬说英美军队在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增加，只是政治上的一种推测，并无实际依据。解放军南渡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反而乖乖地把驻上海、青岛的军舰、部队撤了回去，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带领整个外交使团留在南京，这些都是实质性的措施，而中共对于美国的军事干涉，历来也是清醒和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另一方面，连美国人都懂得“外交使团南移广州会毫无疑问地加强李（宗仁）政府的力量，予其拥护者以道义上的鼓励”，作为中共盟友的苏联的大使却随迁到广州，这还是对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半信半疑，在国共两党间继续脚踩两只船。

默察全局，周恩来很同意毛泽东的分析：“看来，取得苏联承认和支持的关键，除了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外，就看解放军的进军速度了，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解放中南，深入西南，基本解放中国东部地区，而帝国主义也未插手干涉，苏联同志就会对我们有信心了。”

毛泽东点点头，若有所思：“只有中国统一成为定局，斯大林才会作出最后的决定，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我们不能停止或减缓对南方的进军，相反应当改变原定的战略，加快向南方进军的步伐。”

毛泽东所指的原定的战略指的是 1949 年 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里面规定：“1949 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等省的大部，其中一些则是全部”，实际就是控制五岭山脉以北地区，到 1950 年再向岭南、西南进军。

然而，胜利来得比人们普遍的预期都快得多，渡江战役第二阶段已扩大了预定的战役范围，苏皖浙三省的解放已基本实现。有一二个月休整，再用一二个月作战，湘鄂赣到八九月份就可基